

□ 名师轶事

我深深感到联大“有容乃大”的可贵,在大后方以“民主堡垒”著称的西南联大,也有不参加学运、只埋头用功的同学们的自由空间,他们遍读经典,醉心文学(或其他专业),似乎不问政治,但在祖国和人民需要的时候,毅然投笔从军,甚至为国捐躯。在联大从军碑上留下姓名的,不乏这样的人。

群社是联大影响较大的进步组织,他们见许渊冲俄文成绩超前(小考100分,大考100分,总评还是100分),又熟读俄苏文

学,希望他能加入;他怕加入组织会影响学习就拒绝了,人家也不再勉强。闻一多先生批评汪曾祺不问政治,汪曾祺却批评闻一多先生参加政治活动太多;闻先生说汪曾祺向他开高射炮,汪却说闻先生向他俯冲轰炸。师生二人把《诗经》中的比兴用到生活中来了,虽然针锋相对,却不伤和气。

如此宽松自然的环境及人际关系,怎能不令真想读书做学问的学生不胜羡慕而心向往之!

(原载《南方周末》,2010年7月15日)

杨振声与清华

——为清华百年华诞而作

○杨 起 (1943地学)

清华的老人也许还记得,1928—1930年间在清华园乙所里住着一位身材颀长、性情温和、常常叼个大烟斗、有儒者风度的山东人,他就是家父杨振声(字金甫)。

1890年11月24日,家父出生于山东省蓬莱县水城镇一个渔民家庭。他善良耿直、平易近人;他热爱祖国、光明磊落;他淡泊名利、清正廉明;他思想开明、同情革命。

1915年他考上了北京大学国文系。1919年1月与同学一起创办了倾向进步的刊物《新潮》杂志。五四运动时学生们上街游行使用的标语、旗帜就是在《新潮》办公室制作的。

1919年5月4日,由巴黎传来反动军阀政府准备在丧权辱国的巴黎和约上签字的消息时,正在北大学习的杨振声,全身热



杨振声学长

血沸腾,高喊着“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口号,不顾一切地投身到游行示威的行列,成为一名闯将。因他是首领之一,曾两次被捕。

1919年秋，家父考取了官费赴美留学。1924年回国后，曾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多所大学任教。在从教的同时，他笔耕不辍，在各种报刊上发表了小说、评论、散文、诗歌、杂文等近百篇，以表达他的爱国热情和正义立场。

1928年北伐军推翻北洋军阀统治后，南京政府教育部派罗家伦当清华校长，罗家伦聘请他的老同学杨振声为教务长，他们以把清华建成中国一流大学为职志，果断地对清华大刀阔斧地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因为清华是由留美预备学校延续下来的，当时洋人在清华势力还很强，洋教员处于比中国教员高一等的地位。罗家伦、杨振声首先取消了操纵校务的董事会，使清华脱离外交部的管辖，改由大学院(教育部)领导，将清华学校改办为国立清华大学；改变职员高于教员、外国教员高于中国教员、洋文高于中文、洋课程高于土课程等不合理现象。招生方面，宣布：男女兼收，这在全国大学中是开先例的。

罗、杨认为学校要以教学为主，要有好教师。教职员中凡不称职、不勤勉者一律辞退，原来的55名教授，只续聘了18位，还一下子辞退了6名外教，压制了洋势力，维护了民族尊严。在辞退不合格人员的同时，另行聘请了20多位饱学、年轻的教师如：周培源、朱自清等，还到英美等国请来一批国际一流的学者如：陈寅恪、赵元任等。为减少浪费砍去庞杂的机构和冗员。

在排除洋势力方面，家父兼任院长的文学院的效果更为显著。为了纠正人们对西方文化的盲目崇拜，扭转人们对待祖国文化的错误态度，尽管家父的行政工作已

经很忙，他克服困难开创了现代文学课，由于讲课语言生动，绘声绘色很受欢迎。他追求的目标是“创造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学”，他认为：“若没有新文学，不可能有新文化与新人生观，也就不可能有新中国”。因此，在当时的各大学中清华是第一个把新旧文学、中外文学联合在一起的。

为了创造新文化，活跃学术空气，他还兼任学校话剧团的导演，晚饭后常因去排练话剧很晚才回来。此外，他还数次参加清华著名的文艺团体“终南社”的学术活动，应邀与谢冰心、俞平伯一起到“终南社”作学术报告，他讲的题目有《新文学的将来》和《今日中国文学的责任感》等。

正当清华的各项工作蒸蒸日上、蓬勃发展之际，遇上了中原大战，阎锡山控制了华北，再加上罗家伦有些改革举措不受欢迎(如军训)，所以他不得不离开了清华。罗家伦走后，清华校务由以教务长、秘书长及各院院长组成的校务会议维持，代行校长职权。这就是后来被人们称谓的“教授治校”。

1930年6月，阎锡山想趁罗家伦离任控制清华大学，便派乔万选带了几个人坐小汽车来接管清华。这事惊动了清华上下，人们纷纷涌向校门口，那时我在成志小学读书，闻讯也跑去看热闹。我看到，清华人都聚集在校门口(当时校门上方的匾额写的是“清华园”三个大字，即现在二校门)，师生们将乔万选等拒于校门之外，当时任教务长的家父就站在师生的前列与乔万选等理论。双方僵持了好一段时间后，乔万选等看到师生们情绪非常激动，形势对他们不利，最后只好灰溜溜地走了，清华师生们取得了胜利。

据陈岱孙教授回忆：“今甫先生于

□ 名师轶事

1928年秋季始业时来清华大学，是北伐后，清华由外交部改隶于当时所谓大学院（后来之教育部），由新校长罗家伦聘请来任中文系教授兼大学教务长的。1929年大学组织条例经过更改，采取在大学下分立学院的制度；清华成立了文、理、法三个学院。他被教授会推选为文学院院长兼教务长的职务。1929—1930年之交，罗家伦由于学生的反对长期去南京不返，终于辞职。清华校务由以教务长、秘书长及各院长组成的校务会议维持，代行校长职权。就是在是后三四年之间，清华形成了一套后来为人们所称的“教授治校”的制度。作为文学院院长和校务会议成员，今甫先生对于这个制度的创立起了很大的作用。这个制度的是非功罪，将来的中国教育史会作出公正的评价。但在抵抗学校受军阀、党阀控制一节，它却也起了作用。例如，全校教师学生一起挫败了阎锡山以武力接收学校的企图；粉碎了CC党阀集团派其党羽吴南轩为校长以遂其攫取清华为党派基地的阴谋。今甫先生当年都是身当其冲，力持正气坚决地站在群众一边。”

1930年6月，经老教育家蔡元培先生推荐，“性情温和、冲默有量”的杨振声出任第一任国立青岛大学校长。因此家父离开了清华。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平津相继落入敌手，在此种形势下，南京政府考虑，拟将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南迁，为此召三校校长和杨振声去南京议事。国难当头，家父为了国家的兴亡，为了更多的孩子不受奴役和有书可读，义无反顾地抛下即将高考的我和我那尚未结婚的姐姐于敌占区北平（我们的母亲不在身边），只身

奔赴南京。遵教育部令：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教育部代表杨振声组成长沙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三位校长为常委、杨振声为筹委会成员兼秘书长，由筹委会的三名常委与秘书长组成常务委员会，商决一切方针。翌年，长沙临时大学迁至昆明，改名西南联合大学。西南联大是一个没有校长的大学，行政工作以三校校长和秘书长组成的常务委员会为最高行政领导机构，但常委会成员中，张伯苓先生和蒋梦麟先生常常不在昆明，实际上只有梅贻琦和杨振声两位先生主持经常性工作。异地草创那么一个庞大的学校，工作之繁杂、困难之巨大，是不难想象的。作为教育部的代表和临大、联大筹备委员会的常务委员会成员兼秘书长，杨振声深感担子的沉重和责任重大。他认识到，要打赢这场战争赶走侵略者，各界人士都要尽最大努力，因此，除竭尽全力地认真搞好行政工作外，更加埋头于搞好教学。

1940年7月，由于日寇攻占了安南（越南），云南也成了前线，因而西南联大在四川叙永成立了分校。家父又被派到那里去开辟新天地，担任叙永分校主任，这是一个既艰苦又责任重大的工作。况且，那里国民党特务横行，工作非常难做。为了报效祖国、为了抗战，他勉为其难地答应下来。梅校长建议他乘飞机去，他要跟大家共甘苦坚持坐卡车去。虽然叙永条件极困难，但师生们的爱国热情丝毫未减，教和学热情依旧。由于工作繁重、生活艰苦，家父在叙永得了严重的胃病，为他的早逝埋下了祸根。“皖南事变”爆发的消息传到叙永后，同学们上街游行，举行了

一系列的抗议活动，因而招致当地国民党分子的破坏，他们唆使驻军来强行搜查女生宿舍，由于学校方面据理力争才未能得逞。据一位当年在叙永分校参加过为抗议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而举行游行的老校友回忆：“杨振声主任坚定地站在进步学生一边，他举起五四‘民主、自由’的大旗，来庇护学生，坚决反对反动军警到学校抓人。地下党员学生徐树仁（徐干）和袁月如奉命转移离开学校，反动当局来校要人时，杨振声以‘学校只管学生的学习，课堂以外的事学校管不着，那是学生们的自由！’来把他们驳回去。”此外，四川方面想压服家父把叙永分校留在四川，家父说：“我是联大派来的，所以我只听联大的”，就这样把地方势力顶了回去。

家父在西南联大的诸项工作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把白话文引进了大学的课堂。这一举措可谓开风气之先，而且意义深远。1938年西南联大成立了大一国文委员会，在主任委员杨振声的主持下，开始了编选具有西南联大特色的《大一国文课本》的工作。这册课本把反映新文学运动业绩的现代文学作品——散文、小说、戏剧文学、文学理论引进大学国文教材，是在中国现代教育史和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创举。为编好这本课本，他顶着当时教育当局严重的复古倾向和压力，发扬学术民主，发动全体任课教师推荐篇目，几经斟酌、讨论，并在使用中不断总结、增删，至1942年才最后定稿。学校对大一国文非常重视，将其规定为全校一年级的共同必修课。1944年，当时的教育部重申大一国文课必须采用部订教材。联大没有向复古势力低头，而是在使用部订教

材的同时，大一国文委员会另编一册《西南联合大学大一国文习作参考文选》作为补充教材，在1942年西南联大《大一国文课本》的基础上，增选了胡适、鲁迅、徐志摩、冰心、宗白华、朱光潜、梁宗岱等人的名篇。为了避嫌，教材中没选当时在西南联大任教的作家的文章。这也体现出他做人的正派、清廉。这册文选，后来改称《语体文示范》，杨振声为此书写的序言《新文学在大学里》，突出地点明了向教育当局复古倾向作斗争的编印宗旨。可见他为发扬五四新文化传统、推广白话文，堪称殚精竭虑、呕心沥血，实在是功不可没。

1945年日寇投降，祖国光复。

北大复校后，他又默默地教着他的书。由于在叙永落下的病根，回北平以后他身体一直不好。大约1948年上半年，他在府右街北大医院做了胃切除手术，术后，很长一段时间身体未能复原。

北平解放前夕，蒋介石曾两次送机票来要他南下，都被他拒绝。1949年1月17日他与另外35位教授联名发表宣言，劝傅作义顺从民意，谋取和平解放之法，将军队撤出城外。

北平解放后，他仍在北京大学任教，是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北京市文联创作部部长，出席过北京市第三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还发表了多篇歌颂新社会的作品。

1952年院系调整时被调到东北人民大学（现吉林大学），1956年，因病去世。

2010年10月

作者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地质大学教授，因病于2010年11月21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1岁。